

微观制度创新和天津经济竞争力的未来走向^{*}

刘 刚

一、引言

在查阅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天津经济实力或竞争力现状的判断和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通过天津市经济总量与东部诸省市的纵向和横向比较,认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天津市的总体经济实力或竞争力大幅衰落;二是

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分析,认为天津市的经济运行质量是好的,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从经济总量的对比看,近10年来天津、北京、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广东七省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格局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1992年,东部七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份额分别为1.5%、2.7%、4.2%、5.6%、8.2%、8.0%和8.6%,到1999年底,上述比例分别改变为1.8%、2.7%、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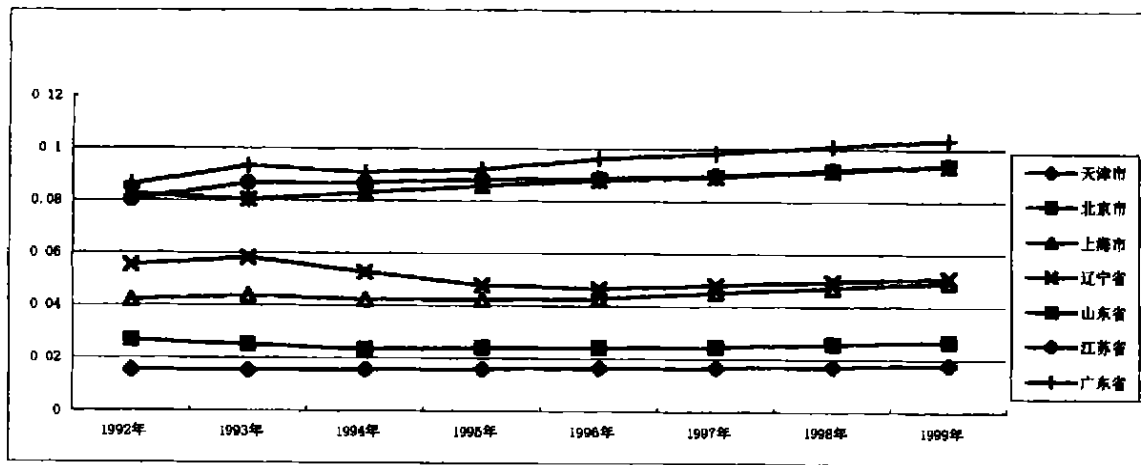


图1 1992~1999年东部七省市占全国GDP比重的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

5.0%、9.4%、9.4%和10.3%^①。在图1中,1992~1999年尽管天津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逐年上升的,但上升的幅度缓慢,为0.3%,仅高于北京和辽宁,而远低于广东、江苏、山东和上海的1.7%、1.4%、1.2%和0.7%。此外,如图2所示,

^{*} 本文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周立群教授主持的天津市科委软科学项目“提高天津市国际竞争力的对策研究”(课题编号:013500111)和本人主持的天津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2001年度)“提升国有大型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系统思考”的阶段性成果。

^①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1999年天津市的GDP只有1450.06亿元,在总量上明显低于其他六省市,仅为上海和广东的36%和17%。经济总量的纵向和横向对比表明,和东部其他发达省市相比,天津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而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看,天津市的

经济运行质量是好的。1999年天津市的人均GDP为15976元,在七省市中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既高于辽宁和山东经济大省,也高于江苏和广东经济强省,分别是山东和广东的1.8倍和1.4倍。从这个角度看,天津经济的竞争力并不像总量指标对比中所显示的那样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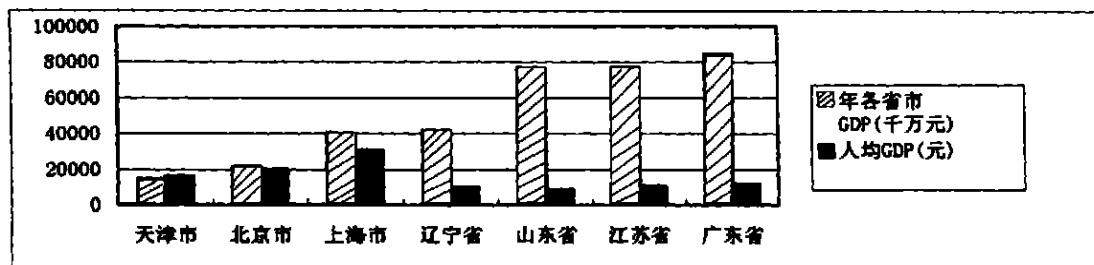


图2 1999年东部七省市GDP和人均GDP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上述两种判断的强烈反差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深入讨论。有的学者指出,经济规模的差异是解释天津经济竞争力现状的主要依据。区域经济规模越大,其资源禀赋具有越强的多样性和潜在的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的累积效应导致了各省和直辖市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而天津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优势,是历史上较好的工业基础及其发展惯性的结果。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规模对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差距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并不适合对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经济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我们认为,对工业企业竞争力现状的评价和分析才是解释天津总体经济实力或竞争力的关键。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不能作为评价天津市经济竞争力的科学依据。因为,天津市是典型的城市经济,工业经济是其经济活动的主体,只有在对天津市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做出准确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地判断天津市经济总体实力或竞争力在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的位置。

二、天津市和东部六省市 工业企业竞争力比较

企业的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企业所具

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金碚,2001)。根据这一定义,企业竞争力首先表现为企业的赢利能力,利润率是判断企业竞争力最重要指标。但是,企业竞争力研究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描述作为市场竞争结果的企业赢利状况,更重要的是发现和总结决定或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因素,揭示导致企业竞争不同结果及其未来趋势的因果关系链条。

一般地说,规模是决定和衡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考虑到我国经济的转轨经济特征,制度因素似乎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变量,而且规模变量本身往往包含了制度因素的作用。因为我国的大型工业企业基本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而小型企业则基本上是民营的。为此,在对企业竞争力进行区域比较的过程中,我们选择了企业规模、制度性规模、企业规模效益和制度性效益四组数据指标,考察决定我国企业竞争力区域差异的因素。考虑到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以及省和市之间经济发展和规模程度的重大差异,对天津市企业竞争力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天津、北京、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广东东部七省市工业企业相应指标数据的比较。表1列举了1999年东部七省市和三大经济区工业企业上

述四组指标数据的情况^①：

表 1 1999 年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和东部七省市工业企业竞争力衡量指标体系表^①

	企业规模指标				制度规模指标			企业规模效益指标			制度效益指标	
	A1	A2	A3	A4	B1	B2	B3	C1	C2	C3	D1	D2
天津	0.505	2.143	0.198	0.434	0.324	0.195	0.481	3.650	2.730	5.206	-1.60	5.81
北京	0.461	2.269	0.195	0.383	0.733	0.084	0.183	3.610	3.610	3.565	3.63	3.91
上海	0.556	2.637	0.229	0.585	0.517	0.088	0.395	5.030	5.690	3.666	5.57	6.12
辽宁	0.606	2.831	0.200	0.583	0.652	0.099	0.249	1.730	2.000	0.943	0.76	4.52
山东	0.471	1.639	0.280	0.610	0.414	0.320	0.267	4.530	4.310	5.041	3.24	4.91
江苏	0.361	1.863	0.304	0.495	0.316	0.252	0.432	2.930	3.850	2.092	2.61	3.91
广东	0.355	2.272	0.347	0.558	0.287	0.121	0.592	3.660	6.020	1.739	5.80	3.34
东部地区	0.427	1.951	0.265	0.491	0.397	0.185	0.418	3.833	4.486	3.021	2.87	4.23
中部地区	0.505	1.593	0.616	0.351	0.659	0.178	0.163	1.773	1.848	1.648	0.426	4.67
西部地区	0.599	1.752	0.13	0.375	0.738	0.086	0.175	0.338	0.374	-0.664	-0.221	3.7
全国	0.456	1.846	0.227	0.447	0.474	0.175	0.35	3.159	3.573	2.584	1.21	4.23

注：东、中、西经济区和全国平均指标值是根据剔除西藏、青海、云南和黑龙江 4 省区的指标数值后计算的结果。其中的企业规模指标 A1、A2、A3 和 A4 分别代表衡量企业规模集中度的基尼系数、大中型、小型和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总产值规模（亿元）；制度规模指标 B1、B2 和 B3 分别代表国有及国有控股、集体和个体及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企业规模效益指标 C1、C2 和 C3 分别代表全部、大中型和小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制度效益指标 D1 和 D2 分别代表国有及国有控股和“三资”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

在表 1 中，无论是东、中、西三大经济区还是各省市之间，衡量企业规模集中度的基尼系数与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两项企业规模和规模效益指标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即基尼系数越大的地区，其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越小，基尼系数越小的地区，其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越高。我国各地区基尼系数与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之间这种反向变动关系，和生产集中度越高企业经营绩效越好的一般经济学原理是冲突的。而解释这一冲突的关键是引入制度规模因素。

在表 1 中，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和基尼系数依次增大，分别为 0.397、0.659、0.738 和 0.427、0.505、0.599，两者成正向变动关系。而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则分别为 3.833、1.773 和 0.338，和

前两者成反向变动关系。这种关系表明，“我国各地区基尼系数与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两项指标之间的‘反常’的、十分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正是由于制度因素所引起的”（程玉春，2002）。

上述结论和我们的经验认识是相同的。但是，当我们把范围缩小到东部地区，尤其是在对天津、北京、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广东经济发达省市进行企业竞争力的比较时，情形似乎有所不同。

在三大直辖市中，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基尼系数

① 本表的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0》，其中企业规模指标数据摘自程玉春：《对我国工业企业的区域经济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2 年第 1 期。基尼系数的数值大小由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和工业企业单位数在大、中、小型企业中的分布状态决定的，它综合反映了各地区工业生产的集中程度。基尼系数越大，则表示该地区工业生产越向少数大型企业集中，即生产集中度越高。

分别是0.461、0.505和0.556,依次增大,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为3.610、3.650和5.030,也是依次增大,呈现出正向变动关系,而不是相反。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看,天津、上海和北京分别为0.324、0.517和0.773,天津低于上海和北京,但是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却低于上海而高于北京。

在东部四省中,上述现象同样存在。广东、江苏、山东、辽宁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分别为0.287、0.316、0.414和0.652,基尼系数分别为0.355、0.361、0.471和0.606,分别依次增大,存在着正向变动关系。而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为3.660、2.930、4.530和1.730,前两者和后者并没有显著的线性反向变动关系。

上述指标之间的关系至少说明,要解释制度因素是否是东部七省市企业竞争力差异的决定因素,还需要引入更详细的数据资料和更深入的逻辑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问题,我们在表1中列出了两个重要的制度效益指标:东部七省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三资”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在这两项指标和其他相关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

第一,尽管天津市和其他省市相比,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低于北京、上海、辽宁和山东,但其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在东部七省市中却是最低的,为-1.60;

第二,尽管天津市小型企业的产值规模在东部七省市中仅略高于北京,而低于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广东,但是其效率却是最高,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为5.206,远高于辽宁、广东、江苏和上海的0.943、1.739、2.092、3.666,也高于山东的5.041;

第三,天津市“三资”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为5.81,仅次于上海的6.12,远高于北京、辽宁、山东、江苏和广东的3.91、4.52、4.91、3.91和3.34。

上述数据关系清楚地表明,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小型企业的高效发展和外资的成功引进及利用三大制度因素是解释天津市工业企业竞争力现状及其未来走势的决定因素。

三、天津市经济竞争力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基本决定因素

经济理论界在分析天津经济总体实力或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过不同的解释,只是没有把制度作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没有从企业层次上分析问题是出现这种认识偏差的根源。例如,有些学者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强调比较优势的偏离是天津经济缺乏竞争力的根源。1997年,天津、北京、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广东东部七省市的霍夫曼比例^①分别为0.62、0.332、0.410、0.193、0.778、0.703和1.040,其中,北京和辽宁的重工业比重最高,天津和上海居中,山东、江苏较低,广东最低。从各省市霍夫曼比例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看,我国区域经济竞争力存在着反霍夫曼比例的现象:重工业比重越高的省市,其经济竞争力越低,而重工业比重越低的省市,其经济活力越大。因而,天津市竞争力的现状可以归结为在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比较优势的偏离,“天津这样的传统中心城市经济的相对衰落的根源,就在于大量的经济特权的逐渐丧失和高度重工业化所必然伴随的比较劣势和低经济活力”(王炳才,2001)。

产业结构因素对东部七省市区域经济竞争力的解释只具有有限的说服力。首先,1999年统计资料显示,按轻重工业划分的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为3.37和3.45,重工业优于轻工业^②。另据国家统计局最新资料^③显示,2001年支撑我国工业发展的六大行业分别是电子通讯设备、电力、交通运输、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冶金和纺织,其中重工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次,它无法说明为什么在三大直辖市中,天津市的重工业比重最低,而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却高于北京而低于上海。从天津未来作为全国乃至世界工业生产基地的发展趋势看,包括重工业在内的生产制造业仍将是天津经济发展的支柱和比较优势产业。问题的关键是目前天

① 霍夫曼比例指工业中生活资料行业增加值和生产资料行业增加值之比,该比例越低,标志着重工业化程度越高。

②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③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2002年4月5日(<http://www.stats.gov.cn>)。

津市重工业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其低效率才是天津经济和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根本原因。因而,制度因素是解释天津经济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变量。

结合表1中四组指标数据的对比分析,制度因素对天津经济竞争力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

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对天津经济和企业竞争力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表1中,天津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之差是-5.250,成为制约天津企业整体竞争力提升的最重要因素。

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首先表现在天津上市公司的数量上。在东部七省市中,天津市上市公司的数量最少,图3描述了上市公司在东部七省市的分布

情况。

到2001年底,天津、北京、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广东七省市的上市公司数分别为22、67、131、55、59、62和136,天津市最少,上海和广东最多。而1999年,其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为-1.60、3.36、5.57、0.67、3.24、2.61和5.80,和各省市的上市公司数基本上成正向变动关系。此外,根据图3纵向数值的对比,从1996到2001年,天津上市公司的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东部其他六省市。

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对天津经济未来发展和整体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将是持续的。因为,上市公司的资源配置过程绝不限于本地,而是全国性的。谁拥有较多的上市公司意味着谁就将配置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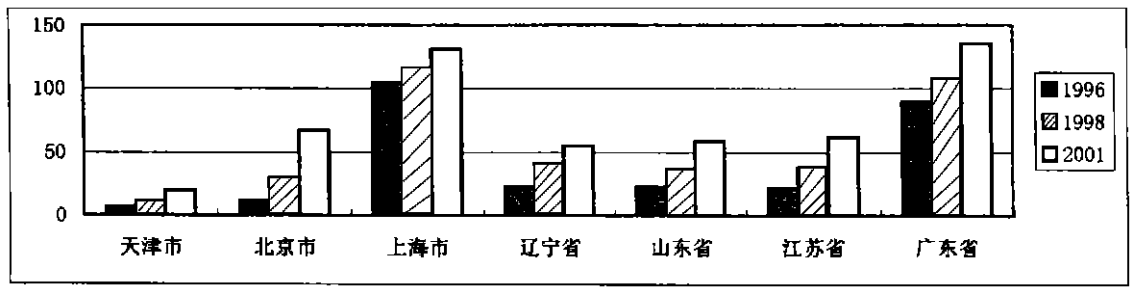


图3 天津市和东部六省市上市公司分布一览

注:1996、1998年的资料来源于《中国证券市场'98机遇与挑战》,2001年的资料来源于中国证券资讯网(<http://www.cnlist.com.cn>)。

其次,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还表现为天津市上市公司的质量上。在图4中,天津市上市公司在同行业内的综合实力排名基本上都在中下游。在1999年“中证·亚商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50

强”排名中,天津、北京、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广东分别有1、6、8、5、5、0和14家企业上榜。这说明,天津市上市公司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东部七省市中都处于劣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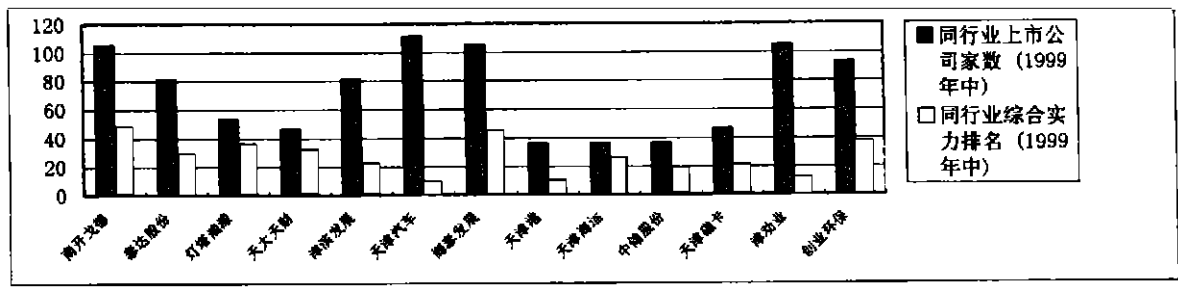


图4 1999年中期天津市上市公司同行业综合排名情况

资料来源: <http://www.cnlist.com.cn>

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的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企业集团建设缺乏实质进展,在总体上,对天津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弊大于利。

我国企业集团的大发展发端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2000年底,由省部级以上单位批准的大型企业集团有2655家。天津市的企业集团大多是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起来的,1999年底,全市企业集团总数达到314家,其中,省部级以上单位批准的有161家,2001年底,市政府重点支持的大型企业集团有20家,其中工业系统10家。但是,企业集团这种短时间的飞速发展主要是行政干预的结果,不符合经济规律,缺乏规范的运作是企业集团建立中的主要问题。在天津市省部级以上单位批准的161家企业集团中,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企业有59家,占总数的近37%,完全规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仅有8家,仅占总数的5%,但其平均利润是全部企业集团平均利润的3.28倍^①。

根据企业集团组建过程中,集团公司是如何形成的可以把我国的企业集团划分为三类:政府行政机构演变型(翻牌公司)、政府主导下的联合组建型和自然成长型。前两者在形成过程中带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并导致其组建后经营的低效率。真正运转正常并产生明显经济效益的企业集团基本属于自然成长型。从天津市重点支持的10大工业系统大型企业集团看,绝大部分属于前两类。自然成长型的只有天士力集团和隆庆集团两家,占总数的10%。表2列出了天津市重点支持的10家大型工业系统企业集团的形成类型。

表2 天津市重点支持的10大工业系统大型企业集团的形成类型^②

行政机构演变型	政府主导下的联合改组型	自然成长型
医药集团	钢管公司	天士力集团 隆庆集团
金耀集团	环球磁卡	
中环电子	天汽集团	
	天铁集团	
	渤化集团	

上述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和失误所造成的制度比较劣势及其累积效应是天津经济和企业缺乏整体竞争力的根源。

2 小型企业的兴起和高效率成长

在表1中,天津市小型企业的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远高于北京、上海、辽宁、江苏和广东,略高于山东,居东部七省市之首。小型企业的高效率提高了天津经济总体运行效率和竞争力水平。

天津市小型企业的高效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小型企业基本上是集体、私营和中外合资企业,无论在行业进入和产品的生产还是在企业经营制度的选择上都有较强的后发优势,其产生和发展是市场驱动和竞争的结果,高效率是其生存的前提。

第二,小型企业的成功得益于天津历史上形成的完备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储备。

第三,小型企业具有较强的群聚生产效应。天津市的小型企业的群聚生产已成规模,形成了汽车配件、管材、装饰材料、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及其零配件生产等为中心的群聚生产。

3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天津经济和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积极的,其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外贸进出口对天津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1998年,天津市进出口总额达到110.78亿元,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到68.6%,在天津、北京、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广东七省市中位居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广东。外贸出口不仅增加出口企业的产值,而且通过乘数效应带动了整个城市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的提高。

其次,外资的成功引进和利用。表3中,尽管天津市“三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并不高,但是外资工业企业的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却仅次于上海。这说明天津对外资具有较高的成功利用率。

利用外资效率的提高是天津市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截至1999年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已经达到2721家,其中合资企业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41.3%,外方投资额占合资企业投资额的65.8%^③。在相应政策引导下,外商通过增资扩股等股权形式和非股权形式在

①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 资料来源:《天津市重点支持大型企业集团提升国际竞争力——工业系统10大企业集团巡礼》,《天津经济》2002年第3期。
③ 参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12月19日。

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对企业实际经营的控制权。这种股权结构的变化和治理结构的改善提高了天津市外资企业的经营效率。

表 3 1999 年东部七省市“三资”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工业增加值 (亿元)	平均成本费用 利润率(%)
天津市	978.86	178.78	5.81
北京市	781.13	218.01	3.91
上海市	2826.95	727.25	6.12
辽宁省	607.94	153.11	4.25
山东省	986.01	262.28	4.91
江苏省	2221.06	544.12	3.91
广东省	6050.85	1504.70	3.34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 2000》。

第三,利用外资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嫁接改造。1994 年以来,天津市政府始终坚持实施利用外资对国有企业进行嫁接改造的政策措施,到 2000 年底,天津市工业累计吸引外资 168.8 亿元用于嫁接改造国有老企业,累计改造了 811 个工业项目。2001 年初,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44.1%,增加值的 41.2%,出口额的 74%来自于嫁接改造后的工业企业。从而使得天津工业企业的外向度比 1993 年提高了 7.9 个百分点^①。

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上述三个方面对天津经济和企业竞争力的作用都是属于制度性的。外资的引入本身就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合资企业股权结构以及治理结构的改善和利用外资对国有企业的改造都是企业层次的微观制度创新。

四、结束语

作为典型的城市经济,工业企业竞争力是天津市经济发展的最终依托。通过企业规模、制度规模、规模效益和制度效益四组指标数据的对比,我们发现,制度因素是天津经济和工业企业在东部七省市中缺乏整体竞争力的根源。在决定天津市经济竞争力的三大制度因素当中,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的作用是消极的,而小型企业的兴起和外资的成功引进与

利用则阻碍了天津市经济总体实力的下滑。因而,实施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微观制度创新是提升天津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第一,充分利用入世的机遇,从是否有自生能力的角度对现有的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加大国有企业破产和改制的力度,通过引入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加速产权多元化的进程和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对现有企业集团进行整顿,撤消徒具形式的企业集团,通过企业自组织能力和市场行为构建企业之间的新型协作关系。

第二,加强对小型企业的融资支持,通过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充分利用民间组织推动群聚生产的技术创新和内在凝聚与扩张能力,把各个小型企业的专业化比较优势转化为群体的竞争优势。其中,特别要关注创新型小企业的发展,这类小企业往往蕴含着成长为大企业集团并最终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潜力。

第三,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仅要重视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质量,而且通过整个城市的东移加强外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扩散力度。

(本文作者:刘 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信 欣

参考文献:

1 程玉春:《对我国工业组织的区域比较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2 年第 1 期。

2 王炳才:《天津经济竞争力的变动轨迹及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1 年第 7 期。

3 金 碚:《论企业竞争力的性质》,《中国工业经济》2001 年第 10 期。

4 刘家平主编:《中国证券市场'98 机遇与挑战》,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5 银温泉、臧跃茹:《中国企业集团体制模式》,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9 年版。

^① 参见《21 世纪经济报道》2001 年 12 月 19 日。